
试论重庆历史上人口迁徙的阶段特点

李禹阶¹

(重庆师范大学, 重庆 400047)

【摘要】重庆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城市, 在历史上有过多次大规模的向内向外的人口流动与迁移。从新石器时代先民部族为了生存的沿江而徙, 发展至 20 世纪 90 年代, 为了三峡工程需要的大规模政策性的三峡移民, 重庆地区人口迁徙具有较为突出的时代与地域特征。这里仅就历史上重庆地区人口迁徙与流动的阶段性及特点进行探讨, 以便我们对于这个问题有一种比较清晰的认识。

【关键词】重庆; 人口迁徙; 政策性移民

【中图分类号】K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652(2013)02-0001-07

重庆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城市。在历史上曾经历过多次大规模的向内向外的人口流动与迁移。正是这种大规模的向内向外的人口流动与迁移, 使古代和近当代的重庆, 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并对重庆城市的变迁与发展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同时, 重庆地区人口迁徙又带有极为突出的时代与地域特征, 通过这种时代阶段性与地域特征的研究, 可以使更加清楚地认识作为西南重镇的重庆, 其人口迁徙与流动的基本线索, 并且通过对这一区域性移民纵向发展线索的剖析, 进一步深入认识我国西部人口流动的特点。在这里主要就历史上重庆地区人口迁徙与流动的阶段情况进行探讨, 以便我们对于这个问题有一种比较清楚的认识。

纵观历史上重庆地区的移民, 大约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 从新石器时代到战国中期, 是巴地先民部族为了生存沿江而徙和向平原腹地发展的阶段

这一阶段, 主要是以巴蜀地域为主的部族性的为了生存沿江而徙和向平原腹地迁徙的举族人口迁移。从新石器时代开始, 原始先民们就在重庆地区, 包括长江中上游的峡江地区同大自然作艰苦的斗争, 生息繁衍。为了更好的生存、发展, 这些原始先民们沿长江、溪流不断地寻找着新的土地与居址, 向着沿江谷地或者高山密林进发或移居。据对瞿塘峡东部与西部地区新石器时代典型器类的考古资料研究, 可以看出当时瞿塘峡以东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因素就对瞿塘峡以西地区的原始文化有着很大的影响。

这些文化上的影响, 一方面是瞿塘峡以东地区古代先民在移民迁入瞿塘峡以西地区时携带而来的; 另一方面也不排除有的器物是交换而来的。依据种种迹象推测, 远古时期重庆地区已有不少长江中游地区的远古移民迁入或者已经开始了商品交换。另外, 根据考古资料, 我们还发现当时的一部分先民们, 溯嘉陵江而上, 向川东北地区, 例如巴中、通江一带迁徙; 一部分先民则向西迁移到川西的成都平原定居。

¹收稿日期: 2013-01-10

基金项目: 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社科科学研究课题“重庆移民史研究”

作者简介: 李禹阶, 男, 浙江绍兴人, 教授, 博士生导师, 重庆市人文科学研究基地“三峡文化与社会发展研究院”主任, 市级重点学科“专门史”专业带头人, 主要从事民族历史研究。

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的夏、商、周时期，古老的巴族，就开始活动在长江中上游的大巫山及峡江内的秭归到巫山一带。

这些古老的巴人，主要以渔猎为谋生手段。长江渔业资源丰富，在山地农业不发达的情况下，巴人依靠捕鱼可比较容易地解决果腹问题。而地处三峡的巫溪盐泉为巴人提供所需之盐，使巴族在这里的鱼盐之地迅速发展起来。从古代文献和考古资料来看，当时大巫山地区的巴族从事煮盐、运盐和贩盐以维持生计。

随着人口的增加，为了寻求更好的生存环境，不少氏族、部落纷纷举族迁徙，这些原始先民从巫巴山地走出来，向东向西迁移。他们或进入长江中游平原，或进入四川盆地。例如巴人巴蛇部西迁巴山或迁入川北；一部分巴民东迁清江流域形成白虎部落；巴人弓鱼部则北迁宝鸡，其后建立弓鱼国；巴人鳖灵部则向南迁徙，到达今贵州遵义地区，并以遵义为中心建立以“鳖”为名的政权。这些大规模的举族迁移，使巴族的历史蒙上了一层神秘而变幻莫测的面纱。

历史进入战国时代，随着兼并战争进程的加快，在重庆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更是出现了频繁的人口迁移。当时在长江中游地区崛起的楚国，为了夺取巴国“盐水”从而占据巴国盐资源，在前 377 年，楚军大举西进，向巴地进攻。经过几次大的战斗，楚威王时（前 339-前 329 年），兵锋所向，攻占了巫溪、巫山、奉节一带，置为巫郡。大量楚人迁徙到巴地，而战败的巴族许多部众则陆续向西南迁徙，到达今湘西沅江流域，唐代《十道志》就说明这一点。

第二阶段：从战国后期秦灭巴到东汉时期，是对西南夷地区大规模移民开发的阶段，也是古代重庆地区的第一个移民开发的高潮

战国中期以后，秦国发展起来，虎视眈眈，气凌列国。这时，南边的巴蜀二国发生战乱，蜀强巴弱，于是巴人只好向秦国求救。秦国司马错力主出兵伐蜀。《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周慎王五年秋（前 316 年），秦大夫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等从石牛道伐蜀。……开明氏遂亡。凡王蜀十二世。”^{[1]26}秦军攻克间中后，挥师南下，“击夺楚巴、黔中郡”，^{[2]如 2993}，夺取了以江州为中心的原巴国南部土地，设置黔中郡。这时，原巴国首都王歌一带成了秦统治巴地的政治中心，巴国残余贵族在反抗秦的“白虎之患”的战争失败后，又一次大规模的向东移徙巫山、鄂西山地，这些地方成为白虎巴人新的聚居区，构成汉代巴郡南郡蛮的主体。

秦政权为加速西南部巴蜀地区的经济开发，加强对于这一地区的开发，大规模地把东方六国贵族、富豪、工商业主、罪犯等迁徙到巴蜀。《华阳国志·蜀志》载：“周赧王元年（前 314 年）……置巴、蜀郡，以张若为蜀守。戎伯尚强，乃移秦民万家实之。”^{[3]128}《史记·项羽本纪》记载：“巴、蜀道险，秦之迁人皆居之。”^{[4]16}《华阳国志·蜀志》曰：“然秦惠文、始皇克定六国，辄徙其豪侠于蜀，资我丰土。家有盐铜之利，户专山川之材，居给人足，以富相尚，故工商结驷连骑，豪族服王侯美衣，娶嫁设太牢之厨膳。归女有百辆之徒车”^{[5]148}胡由此形成了第一次向巴蜀移民的高潮。

秦灭六国之后，仍继续向巴蜀地区进行大规模移民，将六国富豪大户大量迁往巴蜀之地。这样，既扩充了巴蜀地区的人口，改变了当地的民族构成；又削弱了六国势力，对秦朝的统一大业来说可谓一举两得。

秦在巴蜀统治的一百多年里，源源不断地将六国贵族、工商業者、富商大贾、敌国居民、各种罪犯迁徙入川，就其移民的迁徙分布范围而言，几乎遍布巴蜀盆地及周边的各个地区。秦在巴地设置了巴郡及江州、阆中、积、鱼复等县，迁入大量中原移民。

汉初，汉高祖对当时跟随进入巴蜀、汉中的中原士卒采取优惠政策，鼓励他们在当地定居下来。《汉书·高帝纪》记载：汉高祖十一年（前 196 年）“六月，令士卒从入蜀、汉、关中者皆复终身。”这一免除其终生交纳赋税的政策，对于士卒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到了武帝时期，再次掀起对于西南夷地区移民开发的高潮。

当时，为开发巴、蜀、黔中等自古为边疆的少数民族居地，改变这一地区相对落后的政治、经济、文化面貌，政府大量迁移民众到称为西南夷的巴、蜀、黔中等地。汉朝廷在这里设置郡县，将当地少数民族置于中央政府的直接控制之下，并且派遣大批官吏和军队驻扎该地区。《史记·平准书》记载，汉武帝开发西南夷时，“募豪民田南夷，入粟县官，而内受钱于都内”，鼓励内地的汉族富裕民众到西南夷地区进行开垦耕种。

自此以后，汉族移民源源不断地迁入少数民族地区，中原文化在这些地区迅速传播开来。当时，有些与汉族关系密切的羌支首领已习汉文，用汉文记事了。例如在故冉胧夷地界，就有“其王侯颇知文书”^{[6]2858}的记载。这一时期，也有部分巴蜀土著迁入中原、蜀地和汉中地区，形成了巴蜀地区与中原人口的相互流动之势。

西汉末期王莽篡政，时局动荡，中原地区，尤其是黄河流域陷于大规模的战乱之中。中原士人纷纷南迁避乱，出现了北人南迁的状况。当时，巴蜀地区社会相对稳定，战争较少，管理比中原地区宽松，于是就有大量人口迁入巴蜀地区。特别是许多无以为计的中原贫民、边关将士、奴婢等，为求生存，甘愿冒极大风险逃亡巴蜀之地。因此，在从秦灭巴蜀到东汉这一阶段，巴地人口的内外流动既频繁，又规模大，形成了古代重庆地区的第一次移民高潮。

第三阶段:东汉末年到两晋隋唐时期，重庆区域移民主要是躲避战乱、逃避灾荒而导致的人口流动

东汉末年，中原战乱，南阳、三辅居民数万家避乱入川，被益州牧刘焉收编为“东州兵”。公元211年，刘备带荆州兵万余入川，大批的军队及其家属与刘备一起入驻益州，形成了三国初大规模人口移居巴蜀的现象。蜀汉政权建立以后，为了巩固政权，其内部的百姓迁移一直没有停止过。

例如建兴三年(254年)，诸葛亮南征南中，“移南中劲卒、青羌万余家于蜀，为五部，所当无前，号为飞军”^{[7]241}。把数万南中人迁出，分居巴蜀各地，南中各族百姓成为巴蜀地区的编户齐民与北伐曹魏的士兵来源。当时，来自汉中的移民也源源不断。诸葛亮率大兵出祁山，常常驱略陕西、甘肃等地士女迁徙蜀汉。

两晋时期，战乱频仍，中原和关中地区各族普通民众再次四处流散，躲避战乱，于是大规模的民族迁徙和移民活动开始了。当时，百姓流移就食各地，相与入汉川者数万家。在政府引导下，许多百姓流入巴蜀，散落富饶的巴蜀各州郡，成为当地的编户齐民。尤其是“永嘉之乱”之后，北方成为“五胡”与西晋统治者相互厮杀的战场，“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8]1746}。

地处西南的巴蜀地区远离战火，于是，汹涌南迁的大批北方流民，也有一部分迁徙到巴蜀地区。东晋政权建立后，在南方侨民集中之地，设置与侨人原籍相同的郡县即侨郡，对于北方侨民给予免除调役的优待。当时在长江中上游就设置了诸多侨郡，其中就有属于今重庆市的巴郡益州、巴东郡益州。

隋唐时期，巴地移民仍在继续。隋末唐初，发生了十余年的全国性战争。为了躲避战火，为数不少的中原人士避难进入远离战火，“人无寇盗”，“百姓富庶”^{[9]6258}的巴地。从巴蜀地区总体人口情况来看，当时全国总户数呈下降趋势，巴蜀地区人口不减反而有较大的增幅。

例如大业五年(609年)至贞观十三年(639年)的30年里，巴蜀地区就增加了近20万户。在所增的人口中，当有不少是隋末唐初来自中原地区的移民^{[10]131}。

唐朝前期，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但是，安史之乱爆发后，给中原地区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旧唐书》卷120《郭子仪传》云：“人烟断绝，千里萧条。”不少的中原人士纷纷避乱巴蜀地区。

其后，中原、关中地区一直成为藩镇征战之地。至前蜀王建统治时期，“士人多欲依(王)建以避乱。建虽起盗贼，而为人多

智诈，善待士，故其僧号，所用多唐名臣世族”^{[11]787}，进入巴蜀之地的移民更多。这种情况，大约持续了半个世纪左右，直至后蜀建立后，方才逐渐平息^[12]

这一时期，巴蜀，尤其是以三峡流域为主的峡江地区，还是仕宦移民、流贬官员、流贬罪犯的主要地区。历代官员因贬滴至巴蜀，其子孙后代遂为巴蜀人。例如宋代宋德之祖“先京兆人，隋谏议大夫(宋)远滴彭山，子孙散居于蜀，遂为蜀州人”，^{[13]12155}。

第四阶段:宋元时期，重庆区域的移民主要是为了躲避宋金、宋蒙民族战争而形成的人口迁徙。该阶段亦是古代重庆地区人口迁移的第二个高潮

北宋时期，社会政治尚安好。北宋末年，形势急转直下。靖康二年(1127年)，金兵大举南下，攻破京师汴梁。此后，战乱延续，直至南宋建炎年间。这一时期，北方居民不断举家南逃，陕、豫、甘等地区难民纷纷入川避难，使四川成为北方移民南迁最多的地区之一。

宋金和议达成后，双方进入对峙时期，北方人继续向四川流动。特别是南宋政权建立后，更将北民南迁运动推向高潮。史载，建炎元年(1127年)，向子宠在兴州，“设关隘甚备，陕西士民避难入蜀者，皆为子宠所扼，流离困饿，死于关隘之下者，不可胜计”^{[14]193}，说明这时已经出现大量关陕民众南下巴蜀的情况。

南宋后期，宋蒙战争爆发，至1279年，南宋灭亡。当时，大量北方移民南下，迁入重庆。特别是在蒙军大举进犯四川之初，流落于陕甘一带的西北难民纷纷沿着当时的金牛古道、米仓道与荔枝古道，迁往四川万源，再从万源到重庆涪陵一带。

其中许多在南宋后期落籍蜀地的西北流民，在川北一带定居未久，就又被随即而来的蒙军铁骑侵扰，于是又和当地川人一起，向南迁往重庆各地。例如当时远离血腥的战场，“世号桃源”的夔州大宁监(治今重庆市巫溪县)一带就聚集了不少西北流民。而大宁监因“流移辐辏”，以致“生者寡而食者众”^[15]，造成人们生计的困难。

为了躲避战乱，许多巴蜀地区的人口又纷纷向长江中下游迁徙。尤其是在蒙军第二次大规模进攻四川的战争中，巴地民众遭到大肆屠杀，以至于“蜀人受祸惨甚，死伤殆尽，千百不存一二”^{[16]959}。为了逃避蒙古军的屠杀，大批巴蜀百姓，尤其是许多衣冠士族纷纷向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江陵、鄂州、洞庭湖一带迁移，还有许多向着以江浙为中心的东南地区迁徙。

这其中，许多百姓迁徙至巴地就无力再行，在重庆峡江地域定居下来。时人刘克庄说：“自蜀有狄难，士大夫避地东南者众，几置乡国于度外矣”，“自蜀有狄难，而衣冠名族避地者布满荆楚、江、浙”^[17]

元代时期，巴蜀地区的人口流动基本处于比较稳定的状态。但是自元末农民起义军蜂起，战乱频仍，河湖原野尽为沙场。于是一大批江淮百姓为了“避乱”、“避兵”而自发地进入巴蜀地区。

元末明氏大夏政权时期，重庆移民比前期数量陡增。当时不少湖北人投奔明氏政权以寻求保护，于是出现了两次规模比较大的移民活动。其一是随明玉珍进入重庆的湖北军民。其二是明玉珍建立大夏政权后，到湖广等地大量招募民众入川。这前后两次大规模的由湖广军民进入四川重庆的移民活动，使长江中下游向巴蜀地区的移民渐入高潮，以至于有学者认为这就是明清“湖广填四川”之始，或者称之为第一次“湖广填四川”。

史载明玉珍在四川建立大夏政权后，“保境安民，开科取士，兴学校，制礼乐，境内不见兵革凡十年”，不少湖广人“凭借乡谊，褪负从者如归市。以故蜀人至今多湖北籍者”^[18]。

根据《明史·地理志》记载，元末明初四川地区曾有过撤销行政县的情况，在地理分布上撤销行政县呈现出自西向东由多

到少的局面，即撤县最多的是四川西部的成都府，其次是中部的府县，最少的是川东川南地区。川东南地区撤县少，这与该地区人口密度较高有关系。因此，曹树基先生认为：“是否可以这样说，元末明氏招抚的湖北移民大都聚集于此(按:以重庆为中心的川东南地区)。”^{[19]158}这表明，在明玉珍入蜀后，导致大量湖北民众迁入了三峡流域的重庆地区，其人口规模总计可达数十万人以上，由此也形成了历史上重庆地区移民的第二次高潮。

第五阶段:明清时期，也即“湖广填四川”时期，人口锐减导致的人口容纳空间使两湖、两广民众向重庆区域大规模迁徙。这也是历史上重庆地区人口流动的第三次高峰

明代是重庆地区历史上的一个人口流动的频繁时期。元明之际长期的大规模战争，使社会动荡，百姓民舍成墟，生灵涂炭，人口丧失严重，社会经济遭受严重破坏。而每次人口锐减后，都存在大量人口容纳的空间，这就使大量寻找土地的移民开始陆续迁入巴蜀地区。

尤其是地处川东的重庆地区，由于当时以两湖为主的移民，主要是通过长江及嘉陵江等支流进入巴蜀，故四川东部及其重庆地区自然成为这些移民择土而居的居住地。因此，这一时期的移民，很多都分布在川东的重庆地区。

这一时期，移民主要来源范围广，分布在湖广、安徽、江苏、浙江、福建、贵州、陕西、山西、山东、河南、河北等地，但仍以湖广人为主。这些两湖、贵州、陕西等地的农民，为了寻求土地和良好的生存环境，纷纷举族、举家迁移，并且从明初洪武年间一直延续到明代中后期，绵延不断。由于这次向巴蜀地区的移民规模大、时间长，民间俗称为巴蜀历史上的第一次“湖广填四川”。

明末清初，四川与重庆地区发生了频繁的战乱，大量人口丧失，再次出现了人少地多的情况。巡抚张塔曾经奏曰：“昔年生齿繁而虎狼息。自献逆、摇黄大乱，杀人如洗，遍地无烟，幸我大清恢靖三载，查报户口，业已百无二三矣。”^{[20]519}清初，政府为了恢复川渝地区的农业生产，开始频繁采取措施，实行将全国各地人口移入四川垦荒的政策。为此，清政府在顺治到康熙七年(1668年)，大量招川渝逃亡土著回到川渝垦荒、定居。

从康熙七年(1668年)至雍正七年(1729年)，清政府又大量鼓励外省移民填川垦荒，并且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例如给予钱粮补助、政策优抚、任意插占土地等，由此使从湖广向川渝地区的移民成为当时全国人口移动的大趋势。在乾隆时期，大量移民进入巴渝地区。清政府于乾隆五年(1740)专门颁布“山头地角间石杂沙之瘠地，不论顷亩，悉听开垦，均免升科”^{[21]72}加诏令，从而掀起向山地移民高潮。在巴渝一带，移民仍以湖广人为主。例如当时云阳、合川、重庆府，湖广籍移民所占移民总量，分别达72%、67.1%和73%，说明湖广移民遍及巴渝，数量众多，远远高于其他省移民。此后，出现的持续不断迁居四川及巴渝地区的移民浪潮，前后延续数十年，人们俗称这次移民为第二次“湖广填四川”。

大量外省人口迁移进入川渝地区，既使川渝的人口比例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同时又极大地发展了川渝地区的农业、手工业生产，使这一地区的经济得以迅速恢复。这些迁移人口，既包括政府政策鼓励下的大量移民，也包括在“川人回川”中的原籍居民的回流;清初的投诚汉族官兵和入关清兵、屯田兵丁等等。

例如当时清政府“凡遇降寇流民，择其壮者为兵，其余老弱悉屯田”，及“湖南川广驻防官兵，亦择其强壮者讲试，其余给荒弃空地耕种”^{[22]89}。这些军屯移民或投诚官兵移民，由政府安插，多带有强制性，成为“湖广填四川”的重要组成部分。

经过大规模移民，四川以及巴渝地区的人口大大增加，移民数量超过了历次移民的数量。据嘉庆《四川通志》载嘉庆十七年重庆人口3726952人，则此期重庆清代移民及其后裔约有266.8万人，土著及明代遗民后裔约有105.8万人，移民及其后裔占巴渝人口的71.6%。这说明通过“湖广填四川”这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四川以及巴渝地区的人口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它也成了重庆历史上的最大的一次移民高潮。

第六阶段:清末至民国时期,重庆对外开埠及抗战时重庆战时首都地位确立,使中国东部、中部人口向重庆大规模迁徙。这也是重庆历史上的第四次人口流动高峰期

19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重要的变化。重庆既是一个移民城市,也成为一个商业城市。清初“湖广填四川”,各省大量人口迁移到以重庆为中心的川东地区。这一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口又由川东向重庆城市移动。到清代后期,重庆城市内人口已达20余万,其中从事商业活动的占相当大的比重。

1891年,重庆对外开埠,这促使各地工商业者纷纷迁徙到重庆从事工商业活动,又使重庆成为一个典型的商业移民城市。当时的重庆,各省籍会馆众多且能量很大,有湖广会馆、广东会馆、江西会馆、陕西会馆、福建会馆、江南会馆、浙江会馆、山西会馆,云贵公所等等。而由重庆富商大贾组成的总商会,其总理、协理、董事则大都由其他各省籍的商人担任,这说明当时的商业移民占了重庆工商业者相当大的比例。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东北、华北、华东相继沦陷。由于重庆在近代战争中的战略地位,国民政府的国防最高会议决定以四川为抗战大后方,迁都重庆,大批工厂、学校、企事业单位随之迁移,东部人口也跟着内迁。新一轮向重庆进行人口迁移的高潮又开始了。当时,国民政府机关各部门均由南京迁到重庆,大批军政人员、各国驻华使馆等也迁至重庆。同时,东部及沿海地区工厂大量内迁,内迁民营工厂迁入四川者占内迁厂总数的57%,而内迁四川的260家工厂中,有243家迁移到重庆,占迁川工厂的93.5%。各级各类文化机构及初、中、高等学校也大量迁往重庆,使重庆成为各类精英人才荟萃之地。由于迁移到重庆的人口规模、数量巨大,重庆的城市人口也出现了惊人的增长。

据有关统计:西南各省自1937年10月到1941年大约接收移民1000多万人。而重庆市区人口由1937年的47万,飙升到1945年的124万。8年间增加了近80万人,是过去的三倍。在大量人口内迁中,一大批文化领域的精英人才向重庆集中,使重庆人口的文化素质与教育程度,都有很大的提升。

第七阶段:新中国建立后的50年代至80年代,是新中国“三线”建设和改革开放民工大规模走向东南部的时期,也是重庆地区历史上第五次人口移动的高峰期

随着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及位处长江中上游的重庆地理位置的重要性,自新中国建立以后,重庆的人口迁移仍然蔓延不断,并且随着新中国建立后政治与经济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出现人口流动的高潮。这些高潮主要表现为发生在新中国建政后重庆境内的几次大规模的移民活动及其相应的文化现象,即伴随着解放之初第一、第二野战军以及西南服务团进入重庆地区的战争性人口迁移;在冷战时期准备与帝国主义打大战的军事工业内迁的“三线”建设人口迁移,“文化大革命”中为了解决大量人口积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大规模人口迁移,改革开放以后的数百万农民工向城市的人口迁移。

它们依时序分别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60-70年代、80年代至21世纪的今天。具体表现为根据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而出现的西南服务团入渝,三线建设的兴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及农民工潮四个重大事件。

新中国建立后,由于重庆在近当代的重要战略地位,重庆地区的人口迁移与流动仍绵延不断,并且随着新中国建国后的政治与经济形势的变化,不断出现人口流动的高潮。如解放大西南时,大量的第一、第二野战军人员以及西南服务团进入重庆地区,这些人员在重庆地区解放后,留在当地从事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大多数在当地安家,成为重庆建设的主力军。

20世纪60、70年代,国家“三线建设”重点工程启动。“三线”建设包括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等,是相对于东南沿海和东北等一线地区的国家战略大后方,共13个省区,是中国在冷战时期为了备战而对沿海和东北等地区军工企业进行大规模内迁的全国性行动。

当时的迁出地大多是上海、江苏、浙江一带的工业企业，大批技术人员、劳动力及其家属也蜂拥而至。至70年代末，大量军工、化工等重要工厂迁移到四川、贵州等地，而重庆及其周边地域是内迁工厂的重要目的地。据不完全统计，迁移到重庆的“三线建设”企业，其人口前后约达50万人。这些迁徙的人员在重庆迁建、新建了200多项大中型骨干企业和科研单位，使重庆的工业固定资产原值一跃而居全国第五位。这次大迁移，形成了重庆解放以来外来人口迁移的高潮，是重庆在近当代的又一次人口结构的改变。

此外，在“文革”前后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重庆市也曾有数十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作为国家政策性人口迁移的组成部分，形成当代重庆人口迁移大潮。虽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所引起的人口迁移在时间上长短不一，具有时间限定。但是由于它的规模宏大、前后持续时间达十年之久，涉及各个社会阶层，对于城市家庭的覆盖面大，迁移数量有几十万人之多。因此，在全国以及重庆地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据1973年知识青年情况统计，仅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在册知青就有95128人，其中四川知青(主要是成都、重庆两市)41712人，人数最多。到1974年8月，则总计安排知青10万余人。尽管大部分知识青年在几年后都陆续调回城市，但是，它在重庆地区的人口迁徙史上却有着重要的地位。

再有就是民工潮。重庆是中国最大的直辖市，拥有3200多万人口，由于是大城市带大农村，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随着城市化建设的发展，农闲时剩余的劳动力纷纷涌入主城区或其他省市打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流动的农民工群体。这些打工的农民工，在改革开放初期，大都跨省区打工，以补充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工商业快速发展所导致的劳动力不足。同时还有部分农民工，就近流动到重庆主城区或者快速发展的本地城镇，长期居住在这些城镇中。

这些农民工，在农忙、年节时便返回农村，具有来去方便、自由的灵活性。重庆至今仍然每年有300多万农民工在省市外各个省市务工，有400多万农民工则辛勤工作在重庆主城的各个领域，为全国的工业化、城镇化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农民工在外务工，是否是一种人口迁移或者移民呢？这个问题需要分开来看。应该说有一部分农民工，长期居住在本地城镇，平时务工，在农忙、年节时便返回农村。这些人基本上仍然没有脱离本地农村的地域，属于候鸟式的生存状态，不能属于较为固定的人口迁移一类；但是，目前有更大批的农民工，在新的居留地生活、工作数年甚至十余年，已经习惯了城市的生活与环境。他们除了自己在外打工外，其妻子、儿女都带到了打工的城市，在哪儿读书、生活。其中许多人成为企业的高管。他们在农村的身份、户口，都是象征性的，至多每年回家一次或者数次。这些人未来还会回到农村吗？一般而言是不会的。他们的下一代在城市学习，上高中、大学，在就业之后更不可能回到农村。这些人是实实在在的城市新移民。

还有一部分农民工，在附近的城市工作、生活。他们在户口本上的身份是农民，但他已经不种田了，长期生活在城市，主要收入来自于城市打工，一家人也在城镇居住。这些人基本上是不会回到农村的。这就使中国的城市化迅速发展，每个城市中都有着这么一大批携家带口的流动人口居住着，城市的各项工作，尤其是比较辛苦、劳累的工作也离不开这些外来的农民工。而广大乡村则出现人口“空心化”现象。

因此目前真实的中国城市化率比统计报告上的数字可能更高，城市的入住人口更多。这就使得中国的城市承担着巨大的承载人口的使命，城市各项公共设施也越发拥挤，城市房子的刚性需求也越来越大。预计在今后十多年间，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不仅不会停止，反而不断进入城市实际定居的农民工群体会越来越庞大。

第八阶段：三峡移民，是由于三峡工程兴修需要导致的大规模政策性移民，也是重庆地区历史上第六次人口移动的高峰期。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三峡水利工程建设的上马，重庆又迎来了一个人口迁移与流动的高峰，即三峡流域沿岸库区水位线以下的百万居民都要进行向异地、异区、异域的大规模搬迁。

三峡工程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其中涉及的三峡百万大移民更是一道“超世界级”的大难题一到目前为止，全世界不足 100 万人的国家有 30 多个。而三峡工程的百万大移民，等同于搬迁一个中小型国家的人口。并且移民之难，在于它不仅牵涉到政治、经济、文化，而且还牵涉到环境、气候、风俗习惯、乡土人情等诸多极其复杂的事项。

这就使重庆的三峡移民成为牵动全国上下，并且直接关系到三峡工程成败的重大人口迁徙工程。三峡工程在修建中牵涉面积巨大：其蓄水地上至重庆巴南区木洞镇，下到三峡大坝坝址中堡岛，长达 565.7 公里，水库面积达 1084 平方公里，淹没陆地面积达 632 平方公里，需要搬迁安置人口达到 338 万人。其中，农村人口 51.89 万，占 45.85%；城镇人口 61.29 万，占 54.15%。

正因如此，三峡工程百万大移民，其规模之大，跨时之长，牵涉面之广，世所罕见。从 1999 年到 2006 年，前后历时 8 年，在政府的有力组织下，三峡移民走出夔门，外迁到四川、湖北、湖南、山东、广东、安徽、江西、浙江、福建、上海等地区。截至 2008 年底，重庆库区搬迁安置移民 113.8 万人，其中外迁移民 16.16 万人，重庆则承担了三峡库区 85%以上的移民。

在整个移民搬迁中，做到了安全、快捷、有序，安全事故为零，创造了中国移民史上的奇迹，也创造了世界移民史上的奇迹。

以上是历史上重庆地区的人口流动与迁移的阶段性情况。这反映出在重庆历史上，人口流动与迁徙有着比较明显的历史规律和周期性。这便是在宋元及以前，重庆地区的人口迁移是以开发西南夷地区的开发性移民，或者是躲避战争、逃避灾荒的自愿性移民，或者是朝廷流放罪犯、贬谪官员的政治性移民为主；而在明代以后，直到今天，重庆地区的移民则主要是因为战争、灾害、工程建设等，而以政府政策性移民较多。

这其中，由于“湖广填四川”、重庆对外开埠及抗战时重庆战时首都的中心地位，以及国家“三线建设”工程，而使中国沿海地区，以及东部、中部地区向西部重庆地区的移民大大增加。

总之，重庆位于长江中上游，联结巴蜀、荆楚，包囊峡江流域，避居西南一隅，其重要的交通与地理位置，使它在战祸频仍的古代，呈现出许多次为了生存的大规模自愿性人口迁移；而在近当代历史上，重庆作为中国重要的内陆中心城市之一，已日益显示出它的战略地位。尤其在近当代历史中，重庆在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中都作为战略中心地区担负着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使命，其相应的政策性人口移动也相对的频繁、浩大。这也是重庆在近当代以后不断出现大规模移民的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

[1][3][5][晋]常璩撰，任乃强校. 蜀志[A]. 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 3)[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2][汉]司马迁. 西南夷列传[A]. 史记(卷 116)[M]. 北京:中华书局，1959.

[4]司马迁. 项羽本纪[A]. 史记(卷 7)[M]. 北京:中华书局，1959.

[6][南朝]范晔. 南蛮西南夷列传[A]工后汉书(卷 86)[M]工北京:中华书局，1965.

[7][晋]常璩撰，任乃强校. 南中志[A]. 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 4)[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8][唐]唐太宗. 王导传[A]. 晋书(卷 65)[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9][宋]司马光. 太宗贞观二十二年六月癸酉[A]. 资治通鉴(卷 199)[M]. 北京:中华书局，1956.

-
- [10]谭红. 巴蜀移民史[A]. 成都:巴蜀书社, 2006.
- [11][宋]欧阳修. 前蜀世家[A]. 新五代史(卷 63)[M]. 北京:中华书局, 2000.
- [12]谢元鲁. 唐五代移民入蜀考[J].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987(4).
- [13][元]脱脱. 宋德之传[A]. 宋史(卷 400)[M]. 北京:中华书局, 1997.
- [14][宋]李心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 7 建炎元年七月)[M]. 北京:中华书局, 1988.
- [15][宋]阳材. 大宁监劝农文[A]. 字溪集(卷 9)[M]. 四库全书本.
- [16][元]虞集. 史母程夫人墓志铭[A]. 虞集全集[M].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7.
- [17][宋]刘克庄. 何逢吉叙朝散大夫利路运判兼四川制参制[A]. 后村先生大全集(卷 66)[M]. 冯翼甫墓志铭区工后村先生大全集(卷 157)[M].
- [18]跋[A]. 黄陡周氏族谱(卷 10)队. 转引自张国雄. 明清时期的两湖移民[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5:23-24;梁勇. “麻城孝感乡”:一个祖源地记忆的历史解读[J]. 学术月刊, 2009(3).
- [19]曹树基. 中国移民史(第五卷)[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7:158.
- [20]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顺治七年张椿揭帖[A]. 明清史料甲编(第六本)[Z]. 台北:乐学书局, 影印本. 1999.
- [21]王玉鲸等. 地理志·田赋[A]. 同治增修《万县志》(卷 9)[Z]. 成都:巴蜀书社, 影印本, 1992.
- [22][清]王先谦. 东华录[Z](顺治九年). 转引自胡昭曦. 张献忠屠蜀考辨一兼析“湖广填四川”[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0.
- [23]龚义龙. 社会整合视角下的清代重庆地区移民行帮研究[J]. 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2(1).